

宋史十讲

邓广铭 著

中华书局

谈谈有关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代前言)

1. 应当建立一支研究宋史的宏大队伍

就我国目前对各个断代史的研究情况来看,辽宋金史的研究是断代史研究中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与日本的辽宋金史研究情况相较,我们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在辽金史的研究方面,也得承认是落后一些的。现在只谈谈宋史的研究。

宋史研究在近代之所以不曾得到长足的发展,原因之一,应在于前代人没有给我们遗留下较多的研究成果。《宋史》一书在元代末年修成以后,明代即有很多学者对之很不满意,有的要重修而未果,例如汤显祖、归有光等;有的则已经有了成书,例如王洙的《宋史质》、柯维骥的《宋史新编》、钱士升的《南宋书》等。但明代学风,驰骛于空疏议论者较多,而笃实缜密则非所趋重,故上举诸人,不论已有成书与否,其着眼点之所在,都不外乎“史法”、“义例”、“文章”、“褒贬”等事,却不注意对元修《宋史》史料的增补和失误的订正诸方面,对后来之研究宋史者实无多少助益可言。清代的史学家们,包括乾嘉学派的人物在内,因大都没有机会看到《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所以致力于宋代史事之研究而写成专书者,仅有清末陆心源的《宋史翼》诸书是颇见功力之作。原因之二,似乎是在于没有足以震动一时的新史料的发现,像商朝的甲骨、周朝的钟鼎、秦汉的竹简

木牍、敦煌石室的北朝隋唐文书、明清的档案等，因而缺乏一种刺激和吸引的力量，不能使大量历史学家趋向于宋史这门学科之故。

但是，前代人没有为我们遗留下较多的研究成果，这固然可以说是一件不幸的事；而没有足以震动一时的大量新史料的发现，却又使有关宋史的资料有较大的稳定性，不会像其他断代那样，因为有层出不穷的新史料，以致常常使昨日研究的成果，今日又可能为新的资料所动摇或推翻。当然，在没有大量新发现的史料的情况下，宋代的史料，对任何一个宋史研究者来说，也是异常丰富，足供搜讨和采择的。这是因为，在宋代，刻板术已极盛行，造纸术也有很大的发展，所以各种文字记载之流传于后代者特别多。其中，不但纪传、编年、纪事本末这几种体裁的著作是历史书，即对于古代经典的注释中，也常常有一些涉及当代军国大事的评述，笔记杂谈一类书中专记时事的也非常多，而各种文集当中的碑传墓志更多与一代史事相关联。清代的章学诚曾说“六经皆史”，就宋代人的著述来说，则更不妨说“四部”皆史。既有如此丰富的史料遗存，又没有新发现的史料对它们进行冲击，这对于今天的宋史研究者来说，应该说是一种最有利的条件，有了这样的条件，对于前面所说的那一不利条件，即前代研究成果的太少，也正可以变坏事为好事，这正便于我们可以纵横驰骋于宋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和各个角落，去做一些具有开拓性、开创性的工作，不患英雄无用武之地。更何况，即使前代人已经作出了研究成果的一些问题，在今天，我们也应当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的指引下，去一一重新给予估价和考察，用武之地就更为无限了。

我们不应当容忍宋史的研究长此落后于其他断代，甚至落后于域外学者对于这一断代的研究。我们所有有志于宋史的研究者，应当群策群力，分工协作，以迎接挑战的姿态（因为事实上我们早已面临着挑战了），深入地进行一些理论的探讨，踏踏实实而又穷搜博采地收集一些资料，把宋史的研究开展起来，使我们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来说，这是我们应当作出的贡献，也是我们能够作出的贡献。唯一的先决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以拼搏精神，付出极大的努力，而不容许寻求捷径，甚或投机取巧！

2. 必须正确估价宋代历史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这说明，封建社会在其时还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还处于向前缓慢发展的阶段，而不是已经到达了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也还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

且就下举一些事例来论证上述的论点：

(1)在农业生产方面，江南湖泊水渠较多的地区，在北宋期内已出现了大量的圩田，这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提高，因而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

(2)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术虽开始于汉代，而其普遍盛行和技术的大量提高，则是宋代的事；火药和刻板术的发明虽都是唐代的事，但此二者之被广泛采用也都在宋代；发明胶泥活字的毕升也是北宋人；指南针的发明则无疑为宋代的事。

(3)沈括的《梦溪笔谈》当中，记载了很多关于科学技术的事，这固然说明沈括本人科学知识的丰富，同时却也反映出宋代社会上科学技术的水平较前代大为提高。

(4)哲宗时曾做过宰相的苏颂，发明了一种名为水运仪象台的报时器，也可简称为天文钟。其中已经使用了擒纵器。

(5)两宋海上贸易之盛，远非前代之所能比。运往国外的物品，主要为丝绸、瓷器等，这也反映出这两种物品生产量之如何丰富。

(6)在精神文明方面则是：

①文学——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们已在大力提倡写作韩愈、柳宗元式的古文，使宋代文风较前代起了很大变化。所谓的唐宋八大家，北宋一代就占了六名。改骈为散，对于学术文化的传播有很大便利。为了配合音乐，便于歌唱，由五七言诗衍化而成的长短句，即“词”，在宋代也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为元明清诸代之所不能企及。

②史学——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

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书当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类别的书，所记录的都可称为原始资料，尽管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弄虚作假的东西。我认为，宋代史学的发展，主要的不是体现在官修史书种类之多，而是体现在私家著述的质量及其所创立的体裁方面。且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例：

对于司马光的政治主张及其实践，似乎都很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对他在史学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却应予以充分肯定。司马迁自述其撰写《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虽不曾标举出这样的宗旨，而《通鉴》却也确实体现了这样的宗旨。他在编写《通鉴》时，首先把有关资料编写为“长编”，最后则又把不采入正文中的歧异记载收入另册，名曰《考异》，与《通鉴》并行。在历史编纂学方面，从此开创了一种新的而且是很好的方法和体裁。于正书之外再有《考异》，就可以使后来的研究者有“递相稽审，质验异同”的余地了。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诸书，于每条记事之下，大都附有大段的注文，胪举各种异说异文，虽没有辑成专书，称作“考异”，与本书并行，实际上却完全是沿用《通鉴考异》的做法。可见司马光新开辟的这条修史蹊径，对于后代的史学界起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李焘遵循司马光编写“长编”时那一“宁失之繁，毋失之略”的原则，和胪举异说以便读者参考抉择的办法，所以，他虽然是一个“耻读王氏（按：指王安石）书”的人，而在他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宋神宗朝的史事当中，却大量地引用了王安石的《熙宁奏对目录》，有的写入正文，有的附入注文之内。在这部《目录》久已亡佚的情况下，我们正可藉此而得深入了解有关变法的一些议论和周折。另如关于宋太祖太宗兄终弟及时的“斧声烛影”事件，李焘写在正文中的文字不是太多，而注文中所附录的各种记载却是“连篇累牍”，又复不加辨析，以致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为“考据未明”，使成“千古疑窦”。其实李焘对于此事一定是不敢直书其所见（看来他是认为太祖乃为太宗所害的），故意地引录众说，使之迷离惝恍，启读者之疑窦的。这也正好体现了“考异”的一种妙用。而“考异”又是前代的任何史学著作和宋朝任何一种官修史书中所都没有的。

着重于当代史的记述，是中国史学家们的一个优良传统，司马迁《史

记》的最精采部分即在于秦与西汉前期的一些叙事；陈寿的《三国志》也可算是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最精采之处则是唐至五代十国部分。然而唐和五代还只算是司马光的近代史，依照司马光的设想，原是打算在写完《通鉴》之后再着手写一部《资治通鉴后记》，即专写北宋建国后的历史，也就是司马光的当代史。他早已开始了积累资料的工作，可惜他的这一志愿终于未能实现。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等书，却都是以当代人记当代事了。可见着重当代史的这一优良传统，在两宋的史学家中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

③哲学思想——北宋的思想家们，对于从汉到唐的儒生们拘守其各家的师法，并拘限于章句训诂之学的学风，大都深致不满，都要对儒家经典所涵蕴的义理进行阐发，遂形成了一种与汉学对立的所谓宋学。过去，人们大都把宋学与理学等同起来，这是很不恰当的。理学（即《宋史》所称“道学”）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才形成的一个学派，一直到十一世纪之末，即宋徽宗即位之前，在北宋的学术界是不存在理学家这一学派的。

着重于阐发儒家经典义理的宋学，也可以称作新儒学。事实上，它是儒家学者与佛家学者和道家学者在长时期的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渗透、互相吸取之后的一个产物。黄老学派，以及由这一学派演化生成的道教，全是中国的产物，久已与儒家学派在发生着既排斥又交流的关系，不只宋代为然。对此问题，姑置不论。下面只略述佛学与儒学的关系。

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佛教，是宗教而不是一个学术流派。魏晋南北朝时期内，佛教经典著述大量译为汉文，才传入了佛学。当其时，玄学与清谈之风正盛行于士大夫之间，其内容乃是儒家思想与老庄思想的混合物，这正好为接受佛典及其义理准备了条件。故在南朝，讲习佛教的经、论之风即大为盛行，出现了一些知名的经师和论师。及讲说日久，在理论上既各有发展，且多与儒家道家的互相糅杂，从而各派也不再恪守经说，大多有所改造。例如天台宗、华严宗所讲论的均已不是印度的原貌。禅宗所倡导的“佛性本自具足，三宝不假外求”和“顿悟成佛”诸说，即皆出自魏晋玄学，全非来自印度。从隋唐时起，各教派即都自认为“得正法”，受真传，借为本派力争正统地位。还都极力抬高本教派的传授历史。例如，中国僧人所创立

的禅宗,定要追认菩提达摩为其始祖;天台宗也定要上溯至北朝的慧文、慧思。各派都搞“定祖”活动以争取法统、道统中的正统地位。

受到佛教争法统(道统)的影响,唐代的儒家人物韩愈便首先在《原道》一文中也提出儒家道统的继承问题,说什么“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此说一出,后来的儒家便一致接受并世代相传。理学家并不推崇韩愈,但对于“道统”之说则不但接受而且维护。

佛教徒众的生活来源,最初只靠行乞与“受请设会”(即由施主布施)二者,但南北朝的统治阶级大多崇信佛法,寺院财产(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均极雄厚。这对各教派的发展具有极大推动力。具有雄厚经济基础的寺庙,在唐代即频频举行僧讲(专对僧人讲佛教经典)和俗讲(专对世俗人讲通俗道理以募集钱财)。

儒家学派的人也因此而受到启发和刺激,故在唐末五代就开始出现了儒家创建的书院,到宋代更出现得较多,且有著名的四大书院。

儒家学者之所以要抛弃汉唐学者的章句训诂之学而趋重于阐发经典中的义理内涵,其内在原因固在于对汉儒繁琐哲学的厌弃而要转移方向,而其外部原因则也是在于看到佛教的那些学问僧都在讲说心性之学,便也想在这一方面能与之一较高低之故。与韩愈同时的李翱写了一篇《复性书》以阐发《礼记》的《中庸》篇中“尽性命之道”的道理,是从事于这种努力的第一人,也可以说他是宋学的一个先导。

既然要在讲说义理方面与佛教学者和道家学者争高低,便不能不把佛学和道家的理论中可以吸取的部分尽量加以吸取。生活在宋真宗、仁宗之际的一个名叫晁迥(951—1034)的学者,既“崇尚佛乘”、“归心释教”,又把“老庄儒书汇而为一”,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者的面目出现。尽管他在《宋元学案》中并未占有一席之地,但他的这种学风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

《宋元学案》把胡瑗列居宋代学者的首位。胡瑗(993—1059)所著《安定易说》、《周易口义》等书,全是着重于义理的阐发,而对于《易》中的“象数”则“扫除略尽”,成为宋代以义理说《易》的先驱。这也应是受到了释家讲说心性的影响的。他先后在苏州和湖州的州学中做教授,把学舍分为两

种：经义斋和治事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这可见，胡瑗的治学，已经不是去搞章句训诂，而是重在讲明大义，所以要选取一些“心性疏通”的人去治经义。他所选取的人，还要“有器局，可任大事”，说明他的“讲明六经”是要“学以致用”。看不出胡瑗与佛道两家在学术上的直接关系，但他并不像石介那样地排斥佛老。就对北宋的学术影响来说，在所谓“宋初三先生”当中，胡瑗是远远高于孙复和石介的。

《宋元学案》的诸作者，对于王安石（1021—1086）都存有偏见，故把《荆公新学略》置诸最后，这是很不公允的。

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学问家的王安石，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的义理融合为一的人。他曾当面向宋神宗说：“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三，熙宁五年五月甲午）又，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载有一事说：“舒王（按：即王安石）嗜佛书，曾子固欲讽之，未有以发之也。居一日，会于南昌，少顷，潘延之（名嗣兴）亦至。延之谈禅，舒王问其所得，子固熟视之。已而又论人物，曰：‘某人可秤（捩？）’子固曰：‘弃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子固笑曰：‘前言第戏之耳！’”我认为这段记载也是可信的。

王安石还曾说：“圣人之大体，〔后世〕分裂而为八九……有见于‘无思无为，退藏于密，寂然不动’者，中国之老、庄，西域之佛也。”（《涟水军淳化院经藏记》）而他本人不但对佛经作了《楞严经解》，还对《老子》作了注释。

《宋史·王安石传》说他对于“先儒传注一切废而不用”，是事实。他与新党的吕惠卿等人共同撰写的《三经新义》，也都是重在发挥义理而不是重训诂名物方面的。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在《王氏杂说》的《解题》中引有蔡卞所作《王安石传》（可能是《神宗实录》中的附传）中的一段话，说道：“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云。”在《字说》的《解题》中则又说道：“介甫晚年闲居金陵，以天地万物之理著于此书，与《易》相表里。而元祐中

言者指其糅杂释老，穿凿破碎，聒瞽学者，特禁绝之。”

《杂说》、《字说》两书俱已失传，《杂说》的内容不可知，《字说》则是讲文字学的，亦即属于“小学”一类的书，王安石却结合天地万物之理去阐发文字的涵义，可知他和他的同党们所编纂的《三经新义》更必然是把重点放在阐发义理方面的。而他所阐发的义理，如所周知，又都是为他的变法服务的。这也就是说，他的通经也是为了致用的。

周敦颐(1017—1073)，即所谓“濂洛关闽”中之“濂”(他是湖南道州营道人，家居濂溪)。他的学术渊源是：陈搏得《先天图》于麻衣道人，以授种放，种放授穆修与僧寿涯，穆修以《无极图》授周敦颐，而僧寿涯则以“先天之偈”授周。因此，受禅学影响很深的陆九渊对周敦颐是不太推重的。他曾写信给朱熹说：“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老氏学之不正，见理不明，所蔽在此。”

朱熹和张栻，因受道家思想影响比陆九渊较多，对周敦颐就都极为推崇。朱熹说他“奋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圣贤之奥，疏观造化之原，而独心得之，立象著书，阐发幽秘，辞义虽约，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毕举”(《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张栻说他“崛起于千载之后，独得微旨于残编断简之中……孔孟之意于以复明”(《南康军新立濂溪祠记》)。试看朱张称颂周敦颐的这些话，与蔡卞称颂王安石的那些话是何等的相似！

程颢程颐兄弟受学于周，大概只属于启蒙教育，但二程却把儒家学说发展得更抽象、更玄妙精微，并且也更着重于个人的身心的修养。其后再经程门的一传、再传的弟子们的宣扬传布，到南宋便形成了理学家这一流派。

北宋的这些学者们，全都是以“致广大、尽精微”为其治学宗旨的。唯其要致广大，故都有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唯其要尽精微，故都要把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以这一治学宗旨为标准，除上举诸人之外，范仲淹、李觏、欧阳修、司马光以及三苏等人，也全都可以算作宋学中的重要人物，尽管他们的思想见解有大相歧异之处。

宋朝南迁后，理学的流派已经形成，又有朱熹、陆九渊等数大师出现，这一学派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声势和影响都很大，但并不能说它已居于支

配地位。例如与朱陆同时的著名学者林栗、程迥、程大昌，先后出生于浙东的吕祖谦、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就都不能列入理学家中，而是只能称作“宋学家”的。其专以史学家著称的李焘、李心传、彭百川、王赏、王称等人，自然更都不能称为理学家了。

总之，宋代新儒学（包括理学而不应太突出理学）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3. 怎样研究宋代的历史

第一、宏观的研究方法

这首先要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研讨，察看宋代的历史究竟处于封建社会的哪个阶段。对于这一问题，在宋史研究者中迄今并未得出一致的意见。有很多人认为，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地租形态中，也已经出现了货币地租。我以为，这一说是不很妥当的。因为，所谓资本主义的萌芽，必须具备一些一定的条件，例如：（1）劳动力的商品化，即劳动者可以自由出卖其劳动力；（2）必须有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厂；（3）必须有包买商人的出现；等等。而在宋代，却是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至于货币地租，则一直到解放之前，中国全部境土上还不曾出现过货币地租，更无论于宋代了。在宋代出现的类似货币地租的，全只是一种折租，即以实物租为本位，而因某种缘由，临时把实物折合为货币缴纳的。这不能叫货币租。这种种说法既都不能成立，故两宋时期仍然是封建社会。如前所举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诸事例，说两宋已届封建社会的衰落期或崩溃期也是不妥当的。最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它依然处于封建社会缓慢上升的时期，也可称之为封建社会的中期。

其次，须与十至十三世纪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以确定两宋所应占有的历史地位。不论从物质文明或精神文明发展的水平来说，当时的中国（以宋政权为代表）实际上全是居于领先地位的。这不但从中国的四大发明来说，只有造纸术是在唐代传入西方的，印刷术、指南针以及火药的使用，西亚和欧洲诸国则无不是在十三世纪以后；而从两宋与亚、欧、非诸洲的海上贸易来说，从中国运出的，大都为瓷器、丝绸以至铜钱之类，亦即大

多为手工业制造品，而从那些地区与国家交换来的，则多为香料、药材、象牙、玛瑙、车渠、苏木等物，亦即大多为从自然界采集而得者。两相比较，孰为进步，孰为落后，自然也是很清楚的。

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在宋代（或者说从十至十三世纪）能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这个问题当然要从历史发展的动力来寻求解答。在今天，我们不应该对这个动力问题仅仅给予简单的答复，例如说，只有农民的战争和农民的起义，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唯一动力。北宋政权并不是农民战争的产物；在北宋末年发生的宋江、方腊所领导的起义，也全是局部性的，与唐末、元末或明末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无法相比，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说方腊（更不要说宋江了）的起义曾迫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过什么改善。南宋一代的许多次农民起义，包括初期的钟相、杨么、范汝为，以及发生于晚期的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也无不如此。因此，只给予简单的解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说：“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他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也说道：“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我认为，要追寻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也包括要寻求宋代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所以有那样高度的发展，是必须遵循着这样一些原则，从极为错综复杂的一些方面去寻求，才最为妥当的。

第二、微观的研究方法

宏观是对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笼罩全局的鸟瞰，微观则是对具体到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某种典章制度，某种社会现象，某种新兴事物或思想学说，某个特定事件，某次群众运动，某一特定历史人物，以及类似这样的一些问题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便要要求研究者能广泛地去阅读有关史籍，大量地钩稽有关资料，再做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审核考订工作，然后细致地加以排比和梳理，分析和综合，阐发和评价，写为论文或专著。

从事于微观研究，必须练就一些基本功力。过去，我曾因提出目录、职

官、年代、地理为治史的四把钥匙而受到批判，那是发生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期内的事。严肃认真地说来，在我们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运用辩证的方法进行研究时，上举四个方面的基本功还是必须具备的。现在只就与研究宋史有关的目录学略说几句。

从研究宋代史事来说，单凭靠一部清人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可以从中找到绝大部分可用史籍。从十九世纪以来，新出现的重要宋代史籍，只有《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和《庆元条法事类》等书，为数有限。但是，我在前面尽管说过，从乾嘉以至近代，研究宋史的成果并不多，而对那些仅有的成果我们却必须心中有数。对于当今国内外学者研究宋史的信息和情况也必须灵通和了解。目前欧、美、日本的汉学家中专家辈出，不予以足够的重视，不把过去长时期中外学术隔绝所造成的损失疾起进行补救，那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也是极为不利的。以上也可算作目录学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研究宋史的必读书籍来说，不论你所想要研究的是属于哪一方面的问题，下开几种最基本的史籍是非阅读不可的：

- (1) 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
- (2)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
- (3) 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 (4) 《宋史》中的部分《志》（如《选举》、《兵》、《食货》、《河渠》等）和部分《列传》。《宋史》既极芜杂，且卷帙过多，只应从中选读一些篇卷，而很难遍读全书。

(5)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各《考》中讲述宋代的部分。清人章学诚虽对马端临和《文献通考》均力加贬抑，但《通考》中对宋代各种典章制度的记载，却都是可与《宋史》中的《志》互相补充的。

- (6) 黄宗羲、全祖望等人著《宋元学案》一百卷

以上虽然把宏观与微观分别列举，事实上，对每个研究者来说，必须力求把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才行。因为，如果不在一种正确的观点指引之下，而心中又无全局，这样就去进行微观的研究，则势必失之支离繁琐而无所统属；如果不在微观方面作一些踏踏实实的搜讨钻研，而好高骛远，专去从事于宏观的探讨，那等于没有坚牢精密的部件而硬要拼凑为航空飞

机,是不会不失败的。

最后我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两宋政权只是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先后出现在中国领土上的几个割据政权之一,而先后与之对峙的辽(也叫契丹)、西夏和金,也都同样是当时的一个割据政权。对其同时并存的诸政权,例如辽与北宋和西夏,金与南宋和西夏,如果我们只以其中的某一个政权及其统辖区域内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他两个则弃置不顾,这是很不合适的,实际上也是做不通的。所以说很不合适,是因为我们不论要以哪个政权及其统辖区域内的事物作为研究对象,我们都必须对那一时期的全局作宏观的观察,不能再依照历史上原来的政治格局而加以分割。所以说实际上做不通,则是因为,它们之间既经常有些交涉和战争,如仅仅明了一方的情况而不了解对方的,则这一研究工作必不能到达应有的深度与广度,也就是说,从微观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它也是并不合格的。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地大物博,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则极不平衡,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彼此不同,各政权的典章制度也互有歧异,因此,在某些并不互相关联的问题上,不但可以把辽、宋、西夏、金的历史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即在辽、宋、西夏与金的辖区之内,也可以进行分地区、分行业、分专题的研究。我在上面所说的话,并不是排斥这样一些研究工作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第一讲】

论赵匡胤



政和鼎



明刘俊《雪夜访普图轴》

赵匡胤于959年六月被后周世宗用为殿前都点检。其后不多天周世宗病死，他的年方七岁的儿子继承了帝位。这种“主少国疑”的局面引起了赵匡胤夺取政权的野心，他便极力对后周政府中某些职位较高的军政人员进行笼络。到960年正月初，在赵匡胤“自编自导”之下，演出了一幕富有戏剧性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事件，终于把后周政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从此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爆发于第九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规模农民战争，是从中原地区开始的，到八十年代，起义的农民军从关中撤离，又是在中原地区被扑灭了的。紧接在农民战争之后，黄河下游的几个封建割据军事势力之间便又火拼起来，使得潼关以东和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的人民日夕处在战祸之中，生产事业全部遭受到破坏，或则根本无法进行。这样的局势一直延续到北宋政权建立之日，基本上并没有结束。

我说从960年开始了北宋王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这意思是说，北宋从后周政权所承袭下来的地盘，只是黄河中下游以南以北以及淮河流域各地，而在黄河流域的河东（今山西省）尚有一个北汉小王国，河北北部从易州、幽州向东向北则早被石敬瑭出卖给契丹国（辽国）。此外，从长江上游到长江下游，在成都，在常德，在江陵，在杭州，在金陵，都有一个独立小王国。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州和泉州，也各有一个割据势力存在着。

还有另外的一种因素，也因经过长期的积累而造成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症，那就是：从第八世纪晚年以来，唐政府明令改变了税收制度，放弃了租庸调法而改用两税法，不再依照纳税户的丁口而只依照其地产多少而抽取国税。尽管两税法并没有施行得很久，其定章即为唐政府自身所破坏，然而从此以后，即从晚唐以至五代十国，各朝代的政府对于农田的分配问题却全都不再过问，对于农业劳动人手的移徙流亡也都不再关心了。再加

之以从第九世纪后期以来的长时期的战乱频仍，特别是在遭受战祸最久最惨的中原和华北地区，生产事业不能正常进行，大量人口不断地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社会上的病象自然也要益发复杂化和严重化了。

基于上述种种，在北宋政权建立之日，摆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属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属于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其具体内容是：(1)农村中破产失业人口之日益加多；(2)一方面有大量没有土地的劳动人民，而诸路州县却又都有大量荒地不得开发；(3)豪强人家之肆行侵夺兼并，以及包庇大量的附庸户；(4)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对农村的侵蚀日益加剧，还正在替土地兼并开辟道路。

第二，是如何使赵姓政权能够巩固，使它能够益寿延年，而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的问题。

第三，是如何把已经继续了六七十年的割据纷争局面（如果从唐代中叶以后即已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算起，便应当说已经继续了近二百年了）加以结束的问题。

第四，是如何把燕云十六州收复回来，以便能够凭借长城作为国防线的问题。

二

我在上面所举述的，是说，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上和军政局势方面的一些客观情况和现实问题，都要求着新掌权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予以适当的解决。在赵匡胤和北宋初年最高统治集团中人的主观认识上，对上述诸问题的缓急轻重的判断，和我在上面所安排的层次和地位却还是有着区别的。

北宋政权是紧接在五个短命朝代之后而出现的，而那五个朝代之所以短命，除了后梁是被长期与之对立斗争的另一军事实力派（在太原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所推翻、后晋是被契丹入侵者所颠覆的以外，其余各朝则都是被统治集团内部的军人所篡夺的。因此，在赵匡胤既已把政权夺取到手之后，便把如何防止政权转移问题认作最首要的问题。因此，赵匡胤和